

西北大学史学从刊

NORTHWEST UNIVERSITY HISTORY RESEARCH SERIES



学术指导 / 彭树智

主编 / 王铁铮

副主编 / 李利安

三秦出版社

SANQIN PUBLISHING HOUSE

3

中东南亚研究

MIDDLE—EAST—AND—SOUTH—ASIA—STUDY

目 录

中东文明交往的两大历史个案	彭树智(1)
论制约海湾地区安全的因素	黄运发(19)
论中东地区水资源及其纠纷与冲突	王新刚(40)
试析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历史地位	黄民兴(58)
内塔尼亚胡政权兴衰原因探析	杨 辉(72)
略论以色列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	张倩红(93)
苏联解体后俄国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	邵丽英(110)
也门内战后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郭宝华(125)
瓦哈比运动与早期的沙特王国	王铁铮(147)
沙特王国同中国关系的变迁与发展	林松业(170)
凯末尔时期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政治	刘 云(187)
哈里发麦蒙与阿拔斯神权政治	刘精忠(209)
论伊朗的半殖民地化、西方化和现代化	冀开运(231)
伊朗什叶派在沙法维朝的政治作用	于卫青(244)
1948 - 1988 年美国政府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演变	李秀珍(263)
塞人游牧文明与南亚中东农耕文明的交融	尤得文(280)
从南亚核危机看苏印关系	蒲 瑶(287)
巴基斯坦与中西亚穆斯林国家关系	杨翠柏(303)
1989 年克什米尔危机探源	何志龙(324)

试论尼赫鲁不结盟思想及其实践·····	尚劝余(346)
有关阿育王的汉文史料概论·····	李利安(363)
试论阿育王在佛教史上的地位·····	李海波(378)

中东文明交往的两大历史个案

彭树智

一、文明交往：需要历史个案分析

中东历史研究是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东地区是一个由众多国家组成的多民族的地区。它在世界历史上极富特色。中东各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都作过杰出的贡献。

中东地区不但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而且长期以来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地区之一。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聚合，形成了文明交往的诸多独特性。

近现代以来，东西方文明交往史在中东地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战争成为交往的重要形式。特别是在本世纪，战争苦难缠绕着中东各国人民。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就进行过4次战争。战争对中东地区的文明与历史进程，造成了严重障碍，使和平与发展事业举步维艰。

中东历史昭示我们，古往今来，战争与和平这两种交往方式的选择，始终是文明交往的一个重大问题。中东各国人民为

争取和捍卫和平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和为贵”已深深融入他们的价值观之中。因为这关乎中东各国的兴衰荣辱，于是，和平还是武力、合作还是对抗、兼容还是排他、互尊还是互斥、谈判对话还是兵戎相见，成为文明交往自觉性与盲目性的标志性特征。

中东文明交往的诸多特征，需要对中东各国历史进行历史个案分析。这些特征乍看起来是政治、经济或文化传统问题，但究其根底，是历史问题，是对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问题。

通过中东各国古今纵横历史交往的具体分析，中东文明交往的诸多特征将展出异彩纷呈的多姿风貌。这是因为历史研究是以历史真实为特点，而不是以纯逻辑推理为最后结论；这种历史真实，不是从世界某个“中心”出发，推导出涵盖全体的公式及规律，而是从具体的国家出发，作深入、系统和细致的研究，从而揭示出历史的真实。

正因为这种对中东地区各国的细化研究，具体贯通各国的古今历史之变，便为地区史的研究，以至于为世界史的研究，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为人类文明消长更替的交融整体，提供了具体的说明。这是“以小见大”和“综个为整”的方法论。

基于上述考虑，我在《中东国家通史》的卷首叙意中提出，该书所论及的中东各国，“可以说都是对中东文明交往和世界文明交往的历史个案分析。”

这部 12 卷本的《中东国家通史》，现已完稿的《阿富汗卷》、《沙特阿拉伯卷》和《以色列卷》，都是从国家通史的角度，以文明交往为线索，对这 3 个国家的特征进行的不同历史个案分析。

由于阿富汗的文明交往特征我已在《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的文化交往》（《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作过较详细的论述，而在《阿富汗卷》中，只是更充实和更准确些，因而不重复。

本文下面两部分，是《中东国家通史》中的《沙特阿拉伯卷》和《以色列卷》的编后记。根据该书的体例，各卷之前，都有我写的有关全书总思路 and 总框架的《卷首叙意》；各卷最后都有我在通稿之后，从总思路考虑而写的有关国家在文明交往中形成的具体特征的“编后记”。前者已在《中东研究》1999年号上发表，目的在于听取意见，以便修改。后者也是以同样目的在本书中发表，尽量在《中东国家通史》出版之前，再作一次修改，减少漏误，以尽到主编的责任。

《中东国家通史》是西北大学“211”工程的重点项目和标志性成果之一。对于这样高标准的大型课题，我自知责任重大。学校的巨大投入，同时意味着高标准的要求。如果达不到高标准，也无需承担后果，就无所谓高标准；如果没有成功所需的人力和物力，高标准也只是空中楼阁。为落实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必须让所有作者、首先是主编负起责任。主编要负总责，投入最大劳动量，不能有所懈怠。中东史学科建设处于奠基时期，对我们说来，应当在自己岗位上冷静、沉稳、寂寞地坚持，因为只给予而不坚持，是无法成功的。

曾经是遥远的千年已经到来。我希望这套中东国家通史能在中东史学科建设的基础上，增添几块砖石，从而使我国中东史研究在世界史学研究有一席之地。我更希望在21世纪中，有更多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使我国中东史研究产生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成果来，从而跨入国际史学研究的先进行列。

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之根

《中东史》各卷是根据完稿先后来排列卷次顺序的。《沙特阿拉伯卷》按这一原则被编为第二卷。

编完《沙特阿拉伯卷》，我感到沙特阿拉伯王国无论在中东、在伊斯兰世界，以至于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十分突出和令人瞩目的国家。把它编入《中东史》的第二卷，作为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性国家，也是当之无愧的。

如果从文明交往论的角度看，沙特阿拉伯王国这个占阿拉伯半岛 4/5 地区的国家，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摇篮。它的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都呈现出许多显著的特点，主要有：

1. 从宗教文明交往而言，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的发祥地。约占世界人口的 1/6 的穆斯林，把沙特阿拉伯看成是精神上的祖国。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圣地，是穆斯林向往的地方。尤其是麦加及其附近的天房“克尔白”，穆斯林在作礼拜时，都朝着“克尔白”的方向。朝觐的仪式也在这里举行，穆斯林都把朝觐视为一生的圣事。

朝觐是持续不断的盛大交往活动。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从世界各地来到沙特阿拉伯王国，进行朝觐。他们在这一年一度的规模盛大的伊斯兰聚会上相互了解，讨论共同关心的各种事务。纳赛尔在《革命的哲学》中写道：“朝觐应该变成一种伟大的政治力量。世界各国新闻记者……不应当把它作为一些传统和仪式来向读者提供饶有兴趣的报道，而应当把它作为一个定期举行的政治会议看待。”来参加这个伊斯兰世界会议的各国穆斯林，“他们虔诚而兢兢业业地相聚一堂，但是他们是强大的”。当纳赛尔把他的朝觐政治化思想告诉沙特阿拉

伯国王之后，沙特国王说：“这的确是朝觐的真正哲理。”纳赛尔也非常自信地写道：“老实说，我自己不能设想还有其他哲理。”由此可见，这种把宗教交往政治化的哲学，不但是阿拉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文明交往的广泛形式。

2. 从民族文明交往而言，沙特阿拉伯是操阿拉伯语的阿拉伯民族的文明生根之地，而阿拉伯民族的地域，包括从非洲大西洋岸的毛里塔尼亚到伊朗西南、从北非马格里布全部到阿拉伯半岛以及中东广大地区。对阿拉伯人来说，尽管他们的国家不同，但都同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一样，把沙特阿拉伯看作他们的先祖之源。阿拉伯人在文明交往史的突出特征，在于他们的迁徙是同伊斯兰教的传播相伴随，并同征战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密切相关。阿拉伯文明在交往中还同波斯人、犹太人、希腊人和印度人的当地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

阿拉伯人正是在上述交往特征中扩大和巩固其活动范围的。在交往过程中，阿拉伯语尤其值得注意。语言是文明的载体，是交往的工具。以阿拉伯语为民族语言的阿拉伯民族，与一般民族语言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切穆斯林的宗教语言和古兰经语言。它不但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是统一的，而且对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是统一的。阿拉伯字母是世界上使用最广的第二种字母文字体系（第一种是拉丁字母）。波斯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和斯瓦希里语等差别很大的语言，都曾用过或仍在使用阿拉伯字母。阿拉伯语作为阿拉伯人的民族语言，在 21 世纪有希望取代法语而成为国际信息网络上的第五大世界语，到那时其交往作用将更大。从阿拉伯语在文明交往中的重要作用来看，语言的普遍工具性质的确贯穿于物质与精神文明交往的整个活动之中。

3. 从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交往的关系而言，沙特阿拉伯

在实践上的试验成果，同样令人鼓舞。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君主制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除了新月带的约旦、马格里布的摩洛哥以外，君主制国家集中于海湾地区。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六国之中，沙特阿拉伯是最具有典型性的大国。正因为如此，我们把沙特阿拉伯王国从海湾君主制国家群中分离出来，单独列为一卷，作为一个历史个案，着重加以分析。

现代化是阿拉伯文明面临的严峻挑战。对沙特阿拉伯王国这样君主制的国家，传统的伊斯兰性和时代的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尤其尖锐。如何契合二者，是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问题。费萨尔（他被称为“沙特阿拉伯现代化之父”）在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首先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由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制度必须如实反映该国社会所达到的发展现实，因而提出了“科学地、文明地发展沙特社会”，以使它所达到的水平能同先进政权制度相一致，这个制度体现了“伊斯兰教律的不朽的伟大的目标”。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改革既立足于本国的传统根基，又着力解决伊斯兰经典有限性与世俗事务发展无限性之间的圣俗矛盾。它的政策的出发点是伊斯兰精神和原则，但又能从世界眼光看待民族特性，在当代世界的坐标上寻觅传统宗教与现代世俗之间的适应点。费萨尔本人把现代科学技术、创造发明、管理经验看作力量，而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有力量，所以不允许对这些现代成果加以愚蠢地拒绝。“应该向西方人学习，并从中吸取教益的，就是应该发扬我们崇高的品德和固有特性”。这成为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中要解决同西方文明联系的交往观。正是这种交往观，使得这个王国的统治者在他的国家中实现了惊人的变革，同时又保存了固有的精神基础和固有传统。

4. 以石油经贸为纽带、为主渠道而建立起的社会结构，导致了沙特阿拉伯的内部和外部交往的深刻变化。交往不仅局限于政治、社会、文化层面，而是同生产力发展相伴随、以商品贸易为交换手段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经贸交往形态就其开放本性而论，最能反映交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表达交往与生产力之间的内在关系。经贸交往经常成为政治交往、社会交往、文化交往的先导和桥梁。沟通古代东西方联系的“丝绸之路”，世界近代史肇始的新航路与地理大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关贸总协定及今日的世界贸易组织，都是这方面的突出再现。沙特阿拉伯不仅以它的丰富石油资源为依托，开展经贸活动，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建设着各种宏伟的工程，而且成为世界主要能源供应者之一。

石油经贸促使沙特阿拉伯经济高速度发展，它推动了交通、港口、机场、工厂和农业的发展并把人民生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沙特阿拉伯和亚非发展中国家不同，它在经济上是资本剩余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早向西方国家输出资本的国家。石油经贸成为沙特阿拉伯经济发展的中心和现代化的动力。它不但为国内提供了廉价的能源，也为积累和财政准备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它迅速地扩大了国内市场的容量，又使沙特阿拉伯在世界市场上的外贸居于前列。1999年9月，阿拉伯世界百万富豪有20万人，沙特阿拉伯就拥有78000人；阿拉伯世界百万富翁拥有个人财富及资产总额为8000亿美元，沙特阿拉伯富豪就拥有4610亿美元，其中法赫德·阿齐兹国王的石油投资和财产就有280亿美元。这些财富绝大多数存放在西方国家的银行里。大量石油收入流失于西方，既证明沙特阿拉伯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和它同西方交往的关系密切，但又表现了它对西方的过分依赖。资源配置的片面性、产业结构

不合理、人力资源发展的内伤等等问题，导致石油经贸表现为现代化的孤岛。如果不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滞后之间的矛盾，剩余资本所带来的负面交往的结果，恐怕等不到石油资源枯竭之时，就可能重蹈世界近代史初期西班牙的历史覆辙，会由于现代生产方式诸多条件未具备而衰落。

5. 沙特家族政权在处理它与伊斯兰教权势力之间的关系方面的政策，也极富特点。沙特家族为了在伊斯兰教圣地上谋求王权统治的合法性，因而特别重视同宗教权威机构或宗教权威人士的交往。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伊斯兰式的现代化”，首先强调立国之本是伊斯兰精神，并提出以独特的手段，来避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巨大的不平衡性和片面性。它注意用政权和宗教力量的合作，来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和全面性。独特手段中，包括不断加强对宗教发展的投资，赋予宗教在法律上应有的权力和礼仪上极大的荣誉。它尤其全力维护伊斯兰的社会观念，在施政中突出宣传其中的“劝人行善、禁止邪恶”和“真、善、爱”的社会美德，号召用伊斯兰的民族特性来保证社会稳定，从而巩固王权的统治地位。

沙特家族政权慎重地控制现代化的节奏，以缓进的方式，使伊斯兰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逐步适应时代的变化，因而减弱了宗教势力对现代化的疑虑和抗拒。以上政策，较好地处理了政权、宗教和发展的关系，加上石油美元的经济后盾和协调杠杆作用，沙特阿拉伯没有出现直接威胁社会稳定的政治动荡，保证了现代化在相对平稳的状态中发展。

6. 在外部交往中，沙特阿拉伯作为中东海湾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在恢复阿拉伯国家团结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它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其丰富的能源、雄厚的资金和可观的

消费能力，向欧洲、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广泛交往。它已成为中国同西亚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1998 年中国同西亚北非 19 个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为 71 亿美元，而同沙特阿拉伯就达 16.99 亿美元。“石油外交”不仅揭开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两国交往史上的新纪元，而且使沙特阿拉伯在多极化的世界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总起来说，沙特阿拉伯是文明交往中一个很有特征的国家。在文明交往发展的大道上，最重要的因素是：伊斯兰教、阿拉伯民族和石油资源。这三大因素在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中，又集中反映在现代化过程中和中东以及世界多变的形势下，所出现的诸多矛盾上。从一定意义上，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往的创新史。无论是原始工具文明社会、农业自然经济文明社会，还是工业技术文明社会、信息知识文明社会，都是人类在不同交往阶段的创新过程。无论是 20 世纪 50 年代兴起的种种现代化社会发展理论，还是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种种后现代化社会发展理论，其核心都是创新精神。不同之处，在于人们对创新精神有了更自觉的认识。这种认识从内容上说，不仅包括制造部门，也包括服务部门；不仅有知识创新，而且有制度创新；创新不仅指科学技术，而且包括文化。从重要性上说，创新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现代化事业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和国家发展的不竭活力。对于文化上的独立、繁荣、继承和创新的重要意义，也被提高到国家民族的兴旺、昌盛、复兴和发展的高度上来。

沙特阿拉伯是一个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文化深厚、盛产石油和资本过剩的国家，强调稳定的社会环境、民主的政治制度、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富有创新的企业家队伍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是特别重要的。此外，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明和现代化的交互作用方面，也需要创新精神。文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冲突必将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展开。但由冲突到融合是总的发展趋势，新的冲突和新的融合变迁，要求既有世界历史眼光，又能自觉传承本国文化血脉；既有对现代化中现代性的深刻理解，又能对传统中民族性的全面剖析，即用现代观念融摄传统文化的精华。这就是文明交往自觉论，就是文明交往中理性的觉醒、理性的自我批判和理性的成熟发展。

三、以色列：犹太—希伯来文明之源

以色列处于东方和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个交往过程，都同犹太民族的命运和希伯来文明的深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色列是世界上惟一的犹太民族国家，是中东地区阿以冲突中的一方，是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创造奇迹的国家。

因此，《中东国家通史》把以色列排在第三卷，列于中东东端阿富汗和阿拉伯民族、伊斯兰教发祥地沙特阿拉伯之后，完全在情理之中，虽然这完全是按交稿先后的原则办理的。

以色列国家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它是世界文明交往进程中的一个富有诸多特征的历史个案，并能体现文明交往本质属性的国家。

以色列国家是犹太教的发源地，是穆斯林世界中一个犹太人小岛。以色列的名字就是“犹太国”的同义语。在犹太民族的诸多特征中，商业特征引人注目，犹太人被称为“天生的商人”。这一特征同商业在文明交往中重要作用有关。因为商业

不仅是随着分工扩大而从生产中分离出来的经济交往形态，而且是政治交往、社会交往和文化交往的纽带、先导和渠道。古代的丝绸之路、近代的新航路开通，都是著名的例证。近代西方列强为争夺殖民霸权的长期“商战”，则是以战争交往为形式、以商贸和文化为内容的大规模、长持续的历史交往。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包含有商业、贸易、买卖、交易意义的 Verkeer 或 Commerce 来表达“交往”的缘由所在。

但是商业特征只是犹太民族经济才能的一个方面，更深层和特有的民族素质，则是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和重视才能的传统。由于犹太民族在历史上不断遭到迫害，他们的财产多次被掠夺、房屋被焚烧、被驱逐、被屠杀，从而追求知识的愿望特别强烈。增长智慧、锐意创新和善于思考成了犹太人的一种防卫机制。在犹太人的家庭中，学问受到高度重视，孩子从小就认为书是甜的。犹太人家庭几乎都教育孩子说，在房屋被烧、财产被抢时，应该带走的不是金钱或钻石，而是智慧，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对犹太家庭来说，没有比家庭中有一名或几名博士更为荣耀了。独特的家庭教育出精英。在犹太人中产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各种专业人才，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他们人口的比例。

以色列继承了这种传统，现在每年政府预算中用于教育部分高达 10%，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这种倾斜政策的结果，使教育日益发达，为各行各业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凭借着这些人才，以色列能够在农业、高科技、电子通讯、太阳能利用等方面，都居世界领先水平。仅先进的计算机软件和其他高科技产品，每年出口值就有 200 亿美元，按人均计算超过美国。在教育中，创新被放在重要地位，思考被认为是学习的基础。学

习是智慧之门，而思考是由怀疑和答案所组成。知道越多，怀疑越大，寻求答案的意识也就越强，求教于学者、智者的问题就更多，因此特别尊重教师。这种教育哲学，使人们爱书、敬书，甚至不能焚书，即使是攻击犹太人的书。在人均拥有图书和出版社，以及每年人均的读书量的比例上，以色列也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成为世界之最。

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国家发展的速度，不可能超过教育发展的速度。21世纪是一个由智慧和思想推动的经济发展的世纪，没有哪一项任务的重要性超过教育。这是以色列和犹太文明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我在为张倩红的《犹太人·犹太精神》一书写的序言中，曾经提到了犹太民族在历史交往方面以自身独特的活动，丰富了文明交往的内涵和本质属性。这些本质属性是：①文明交往的实践性，即人类的实践理性正是从人们交往实践中产生，而不是从外部的自然方面和内在的主体方面产生；②文明交往的开放性，即没有文明交往的相互开放，就没有真正的人类关系，在这里不是主客体间的认识，而是主体间的开放性交往；③文明交往的迁徙性，即空间位移的人类各群体的迁徙交往，造成了诸民族的产生、发展、吸收、扩展、聚合、分解、乃至消亡等复杂的过程；④文明交往的互动性，即各民族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基类型交往中的细化、互容、互变和互动；⑤文明交往中的多样性，即在世界丰富多彩的文明之间，以正常的秩序彼此尊重和相等相待，使多样性成为世界充满活力、竞赛和创新的动力和源泉；⑥文明交往中的民族性，即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在时代发展和世界潮流中确立自己的文化定位。

由于犹太民族为生存而不断奋起抗争的痛苦经历，特别是

大流散期间的特殊交往活动，流落到世界上 80 多个国家，而且在许多地方遭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使之长期成为一个没有共同国土的民族。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在欧洲残暴地杀害了 600 多万犹太人，约占全世界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是苦难兴族，犹太民族“困而后知，勉而行之”，在世界范围内的交往实践活动中，以其文明的开放性、迁徙性、互动性、多样性和传统转化性，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文化疆界”，创造了“经济领域”，使这个缺乏“地域疆域”的民族文明，经千祀而仍展现辉煌。

1948 年犹太民族建立起以色列国家，实现了在两千年流亡生活境遇中的梦想。然而，这个 60 万犹太人的国家却在取得令自己骄傲成就的同时，也面对着许多难题。建国以来战争不断，中东和平进程曲折艰难，国内宗教差异积怨日增，经济困难增多，族系间的隔阂日显。以色列在建国动荡的五十年过后，仍在内部和外部交往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这种忧患意识在当代希伯来文学中反映出来。古代希伯来文正像古希腊文一样，已经死亡，几个世纪后又开始复兴，现在成为简洁但含意深刻的以色列国语。作为“新浪潮文学”杰出代表的阿摩司·奥兹（1939—）在以色列建国五十周年纪念时说：“我们在过去五十年里还没有确定游戏规则。”他指出，由于以色列人民是强调意识形态的动荡时期，怀着犹太人的千年愿望，从零开始建设自己国家的，因而，“在希望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几乎找不到两个意见一致的人。”

阿摩司·奥兹是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长、在以色列建国后成为作家的犹太人。饱经罹难、因袭古老宗教文化传统重负、战争阴霾的时刻笼罩、面对四面楚歌式的阿拉伯文化围困，使他着力于描写恐惧、负疚、罪与罚以及许多非正常交往状态下的

忧患意识和情感。他在二十多部文学作品中，把战争、冲突、宗教、家园等问题，融入日常家庭交往活动之中。

在阿摩司·奥兹的笔下，始终围绕着当代以色列希伯来文明交往中的两大主题。

第一，传统民族性与时代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阿摩司·奥兹最欣赏《旧约》中优美、简洁、凝炼、具有很强张力的语词，他一直试图在创作中保留住这些传统。他在1968年出版的小说《我的米海尔》，句式简短明快，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他深有体会地说，用希伯来文来创作，不仅要殚精竭虑地在质料坚硬的大理石上雕刻，还要一目了然地在沙漠中作画。他认为，在传统这盏明灯的映衬下，一切都尽收眼底，这就是耶路撒冷之石的风格。的确，凡读过《旧约》的人，都为其既简约又繁复的风格而赞叹。凡到过耶路撒冷，观察那些时而在夕阳下闪着铜红色暖光、时而又在月光下增加一层清冷的石头的人，都会想起奥兹的风格。奥兹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为代表的现当代希伯来文学大家为榜样，把希伯来传统与西方意识流方法有机结合、充分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在禁忌与自由当中，描绘出耶路撒冷动荡之中的一点平静，离乱之中的一片港湾。正如他在《我的米哈尔》（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所载《致中国读者的一封信》中所说：“中文和希伯来文都存在于数千年之久，两种语言都留下了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创作。泱泱华夏与区区以色列均面临着将源远流长的古代遗产同充满活力的现代创造协调一致的困难。我们有许多地方要互相学习，有许多地方要互相了解。”的确，只有楔入各自民族文化历史交往心灵深处的至深理解，才能突破文明沟通的屏障。

第二，理想主义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何去何从》出版于1966年，是以他1954年投身于胡尔达基